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珍稀文献

新京备乘

陈乃勋 辑述
杜福堃 编纂
顾金亮 陈西民 校注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新 京 备 乘

陈乃勋	辑述
杜福堃	编纂
顾金亮 陈西民	校注

东南大学出版社
· 南京 ·

内容提要

《新京备乘》，民国南京地方志。辑者陈乃勋于民国十八年(1929)“授代第三专税局务”。此时他虽年已六十，然“忆昔山川登眺，每耽康乐清游，杯酒纵横，未除元龙豪气。抚白马红羊之劫，感慨沧田；访龙蟠虎踞之遗，歆歆故垒。漫为札记，藏诸巾箱”。后来他将书稿示其姻亲杜福堃，杜氏为之而补缀亡佚，“复发其旧所藏书相与考订”，“哀然成帙”，于民国二十一年由清秘阁南京分店铅印，民国二十三年重印。该书内容专以金陵为限，除历史记述外，上限始于明清之交，下限迄于民国十九年(1930)。凡3卷。上卷11门，收录城治(附故城)、山水、古迹、名胜、园第、祠宇、寺观、陵墓、公廨、街坊(附桥)、井泉共253条；中卷4门，收录建置、政闻(附官制)、掌故、人物共60条；下卷7门，收录艺文、金石、名人轶事、风俗(附游观)、灾劫、物产、杂摭共104条。该书资料采摭繁富，纪述精详，堪称100年前南京古迹遗存的全真记录。《掌故》一门还收录了一些稀见的太平天国史料，如《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始末》、《讨满清诏》、《祭明太相寝陵文》、《太平天国政教一斑》、《钱江兴王策》、《石达开复曾国藩书》、《李秀成招降赵景贤文》、《李秀成谕李昭寿文》、《苏州王崑上忠王取上海策》等，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颇多裨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京备乘 / 陈乃勋辑述；杜福堃编纂；顾金亮，陈西民校注.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9
ISBN 978-7-5641-4728-0

I. ①新… II. ①陈… ②杜… ③顾… ④陈…
III. ①南京市—地方史 IV. ①K29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0910号

新京备乘

出版发行：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南京市四牌楼2号 邮编：210096
出 版 人：江建中
网 址：<http://www.seupress.com>
电子邮箱：press@seupress.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00 mm×1 000 mm 1/16
印 张：14.75
字 数：227千字
版 次：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41-4728-0
定 价：68.00元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传真)：025-83791830

略论南京的文化品格

——代校注者前言

南京是一个让人一言难尽、欲语还休的城市。

前人对南京的评价，至少有三句，颇让南京人引以为自豪。第一句据说是诸葛亮所言，“钟山龙蟠，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着眼于南京的山川形胜。再一句是吴敬梓的“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赞美六朝古都的人文渊薮。第三句便是朱自清所言，“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遗痕”，说的是这座古城，尤其是老南京丰富的历史人文遗存。换了今人的说法，就是“每一寸土地都有故事”。

时至今日，南京这个大“古董铺子”，很有点像夫子庙的小古董铺子，里面多是些仿古的货色和现代的工艺品了。南京号称“六朝古都”，但是除了郊外那孤独的石壁邪，六朝旧迹再也无处寻觅。南京又是“十朝都会”，但是没有一个朝代在这里善始善终。在此建都的王朝大多偏安、短寿，在一次次交替上演的仓皇辞庙和开国盛典悲喜剧中，南京城屡遭离乱和浩劫。这些浩劫在诸多层面对南京产生影响。

首先是物质层面的影响。

南京在历史上历遭毁城之灾，且不说在隋文帝杨坚将建康“荡平并耕垦”的诏令下，建康都城、州城、郡城等统统荡平为田，官署、宫殿等建筑全部拆毁，绵延 300 余年的六朝都城成为一片废墟；也不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名天京）时期，为了营建天王府及众多王府，拆毁了明故宫和各处庙宇，在 1856 年发生的“天京内讧”中有“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之誉的明大报恩寺琉璃宝塔被韦昌辉下令炸毁，1864 年 7 月湘军攻入天京时又大肆洗劫，纵火烧了七天七夜，全城房屋十有八九被烧

毁,“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那些历朝历代所幸存下来的建筑古迹几乎荡然无存;单是侵华日军攻陷南京时期,日寇四处放火,全城三分之一的建筑、多达 13 万间的房屋毁于火中,城南古老的民居与夫子庙等多处文化建筑几乎成了废墟,“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一次次地毁灭,又一次次地再生,这就是南京悲壮而不屈的建城史!因此,我们不必感慨南京遗存的古迹与她厚重的历史不相匹配,而应该用心感受她的苦难、沧桑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再生欲望!南京的每一处历史遗存——哪怕是一块城砖、一截碑刻抑或是一处遗址——即使以残损之面目映入我们的眼帘,我们也应该为之欢呼,因为它们幸存至今实在是一件小概率事件,它们是弥足珍贵的。

文物遗存如果是毁于硝烟和战火固然令人无奈,如果是在升平时代以“建设”的名义被“谋杀”,那就着实令人惋惜了。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大力建设新首都南京,就曾致使南京大量的文物古迹遭到破坏。以明城墙的命运为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蒋介石的授意之下,拆除了南京太平门至丰润门之间的城墙,用城砖来建军校讲堂。包括中山陵的设计者吕彦直在内的建筑师也曾建议拆除南京东、南两面城墙。当时拆毁城墙在原址修环城公路被认为是一种方便、经济的方式。但是拆毁城墙的动议遭到了以徐悲鸿为代表的文化名流的一致反对。徐悲鸿说:“南京之为国都,在世界各都会上占如何地位,我不敢知,我所知南京之骄视世界者,则自台城至太平门,沿后湖二千丈一段之 Promenade,虽巴黎之 Champs-Eises 不能专美。因其寥廓旷远,雄峻伟丽,据古城俯瞰远眺,有非人力所计拟及者……”《首都计划》的主要编制者墨菲更是有着超越时代和同行的眼光。他在《首都计划》中提出了不拆城墙,而在上面修环城大道的构想。由于墨菲的坚持,再加上当时国民党实权人物孙科的支持,南京明城墙最终在首都建设中幸免于难。而明朝皇城遗址就没有明城墙那么幸运了。中山大道的规划是首都建设的大手笔,它的修建对于南京城市格局致命的影响不在于 400 余户民居被拆,也不在于当时提出的“要建设先要破坏”、“不能不牺牲少数人的利益”等拆迁口号对后世的示范作用,更在于由于被赋予了浓重的政治意味,肩负着表达孙中山先生破除帝制的决心,这条新的城市轴线不仅切割了明故宫,而且

大肆破坏了明代城市的历史轴线。围绕着政府重点规划的中山大道轴线,逐步建成的五院八部等重要行政机关主要分布在中山大道的两侧,建立了新的东西向空间秩序。此后随着南京城市建设的发展,除了皇城区的城门、祭坛等遗址被保留外,明朝皇城区旧有的东西向轴线关系已基本消失。明故宫飞机场的修建则开启了大规模占用明故宫遗址的先河,加上机场的几次扩建以及周边建筑的不断增加,对南京古都风貌的延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历史地看南京也是为今天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民国风貌付出了高昂代价的。

历史的天空下从来不乏人物风流。当时有一位极富历史责任感的学者朱偁先生,为了给后人留一点古都记忆,更为了督促政府保护文物,背着一架德国相机,用了三年时间亲自摄影、测量、调查南京的名胜古迹,在实地考察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金陵古迹图考》、《金陵古迹名胜影集》和《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三书,堪称系统介绍南京历史文化遗存的开山之作。朱偁先生在《金陵古迹名胜影集》序中说:“余来金陵,适值新都建始之秋,街道改筑,房屋改建,地名改命,其间变化之繁,新旧递嬗之剧,实其他都城所罕有。新都之气象,固日新月异,然古迹之沦亡,文物之渐灭者,乃不可胜计。余深惧南都遗迹,湮没无闻,后世之考古者,无从研求,故就今之所见,遗迹之犹幸保存者,实地调查,摄为图版,辑为图考,以保留历史遗迹于万一。”朱偁先生当日恐惧华夏衣冠沦丧、悲悯中华文献轶弃、忧虑先民文物毁坏的种种苦心溢于言表。

有人说:“一个对山水和历史同样寄情的中国文人,恰当的归宿地之一是南京。”这句话用在朱偁先生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南京是他事业的起点,也是他生命和事业的终点。1955年3月,朱偁先生被任命为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负责分管文物保护。1956年4月底,南京市政府为军事学院基建用砖批准在太平门已拆200米缺口处再拆100米,当时朱偁先生就提出了不同意见。6、7月间,朱偁先生接到中华门内瓮城即将被拆毁的紧急报告,他心急如焚地赶到毁城现场,发现城墙已经拆到中华门内瓮城附近,中华门眼看就要成为一堆瓦砾废墟。另外草场门以南、芦席营以北的石头城遗址也已拆得面目全非,幸好作为石头城最有代表性的部分——鬼脸城还未破坏。他立即赶到南京市政府,对此提出

批评,并加以制止。鬼脸城和中华门总算保住了。但是8月下旬,为了筹集救灾赈济款,在“古为今用”的旗号下,古城墙被当成摇钱树将被有计划、有组织地拆除,据说一块城砖可卖一毛二分钱。朱偁先生于1956年9月23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南京市城建部门不应该任意拆除城墙》一文,对南京市有关部门提出严厉批评。最终城墙保住了,中华门保住了,鬼脸城也保住了,然而朱偁先生在接下来的1957年因曾经批评拆毁古城墙一事被定为“右派”。“文革”开始,惨遭迫害,于1968年7月含冤辞世。

艾煊先生在他的《帽子与城墙》一文中说:“只有朱偁直接拿‘帽子’换来的这座中华门城堡,到底没有被拆被毁,今天依然巍巍耸立。覆舟山以北直到神策门,那条玄武湖水边的堞影美景,依旧令人心旷神怡。这座门、这道墙,竟没有被毁,也许是人们慑于朱偁的正气、傲骨和勇气,也许是出于对朱偁悲惨命运的怜悯或同情。若在古代,人们会把朱偁视为护城之神而去敬重他。”朱偁先生把南京的文物古迹融入自己的生命,也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南京的文物古迹,他用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名字深深地镌刻在古城墙上。

近几十年来,在中国的大江南北,城市现代化的步伐不断加速。在隆隆的推土机声中,在百舸争流似的GDP竞赛中,南京如同一个百岁老将,抖擞精神,披挂上阵。但南京有些力不从心了,尽管很努力,但是南京没能跻身中国一线城市的行列,她甚至常常为自己的城市竞争力不及省内的苏州而焦躁不安。尽管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目标很明确,但是新的“建设性破坏”和“保护性破坏”也不时有发生。朱偁先生80年前的警告言犹在耳:“先民文物得以保存而不坠,则固民族文化之大幸。设不然者,南京竟变为完全欧化之都市,虚有物质文明之外表,则吾之图考将永成为历史的记载,此固民族文化之不幸,然而是则无可奈何,亦唯有听之耳。”未来,我们的子孙该不会仅从朱偁先生的遗著中感受南京的古都遗韵吧?

二

比物质层面的影响更严重的可能是精神和心理层面的影响。

“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六朝时代的南京充满自信又不乏阳刚之气。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的誓言以及宗愨“愿乘长风破万里浪”的干云豪气无疑昭示了六朝的进取精神。宋武帝刘裕雄霸天下的韬略堪比曹操，“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他两度北伐，一度收复洛阳、长安，“定乱代兴”，开创了南朝。王夫之如此评论刘裕：“宋武兴，东灭慕容超，西灭姚泓，拓跋嗣、赫连勃勃敛迹而穴处。自刘渊称乱以来，祖逖、庾翼、桓温、谢安经营百年而无能及此。后乎此者，二萧、陈氏无尺土之展，而浸以削亡。然则永嘉以降，仅延中国生人之气者，唯刘氏耳。汉之后，唐之前，唯宋氏犹可以为中国主也。”但是唐朝之后南京渐渐地与享乐、偏安、亡国联系在一起，在频繁的政权更迭和社会激荡中孕育出一种特殊的文化心态——兴亡之感与忧时意识。李商隐《咏史》诗云：“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杜牧《泊秦淮》诗云：“烟笼寒水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刘禹锡则用《西塞山怀古》发出深长的感喟：“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历史上的往事、眼前的故垒、当世的颓态和胸中的感叹交织糅合在一起，怎不使人心生苍凉意境和沉郁顿挫之感？意犹未尽，刘禹锡又一鼓作气创作了《金陵五题》。其一《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其二《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一组诗凝成了一声声深沉的感叹，穿透金陵古城漫长的历史。到了宋朝，陆游即使游览金陵水西门城楼也是满腹心事，不停地念叨着“孤臣老抱忧时意”。到了元代，萨都刺《满江红·金陵怀古》词云：“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玉树歌残秋露冷，胭脂井坏寒蜃泣。到如今，只有蒋山青，秦淮碧。”可叹国运和人生如梦似幻，“富贵终如草上霜”！清代郑燮《六朝》诗云：“一国兴来一国亡，六朝兴废太匆忙。南人爱说长江水，此水从来不见长。”这首诗以浅白的语句写出了历史对于六朝的冷酷，其间还蕴涵着南人的一种无奈情结：气承长江之势、地拥虎踞龙盘的六朝，为什么兴废如此匆忙？……

历史的沧桑和城市的盛衰郁积成绵绵不绝的忧伤,渗入血液,浸入骨髓,并且化作文化基因成为南京城市性格的显著特征。有哲人说过:“流血的创口总有复合的盼望,而在心中永不痊愈的是那不流血的创伤。”不知刻在南京记忆深处的伤口,可有愈合之期?

南京是一座古都,但与南京一样是中国古都,且“古”的程度皆比南京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西安、洛阳、北京等,并没让历代诗人们写出太多的“长安怀古”、“洛阳怀古”和“北京怀古”。南京遭遇过太多的毁灭,遭受过太多的杀戮,目睹过太多的鲜血。有人或许会说,别的城市难道就没有被毁灭、被杀戮的历史吗?当然也有,因为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度,中华民族本来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但是,就中国的几大古都来说,其多灾多难的程度终究没有哪一座能与南京相比,这也如同世界上最古老的几个国家和民族,其所受磨难的程度都少有能与中国和中华民族相比一样。为此有人便将“中国最伤感的城市”的帽子送给了南京。然而,一座城市终究是不会伤感的,伤感的是人。“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个“忆”字用得,江南本来就是用来“忆”的,地处江南的南京自然更是用来“忆”的,于是,南京人便沉浸在历史的云烟中,任“六朝如梦鸟空啼”,任“六朝旧事随流水”,任“一江春水向东流”……

三

南京人素有“大萝卜”之雅称,但是出处不详。叶兆言先生认为,“南京大萝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六朝人物精神在民间的残留”;南京人“自由散漫,做事不紧不慢,这点悠闲,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南京人好客,不排外,习惯于接受命运的安排”,“历史的原因,造成了南京人听天由命的懒惰性格”。对此,本人不敢苟同。叶兆言先生确实比较客观地揭示了南京人的一种粗犷和不求上进的文化心态,但是要把它归咎于六朝,则六朝就有些不能承受之重了。一是南京人“斩半只盐水鸭就可以应付一顿”,与“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之间不能划等号,前者反映了现代南京人在物质生活态度上的得过且过,而后者说的是老南京在精神层面的安然、清逸和愉悦。“烟水”代表了南京秀丽的自然风貌和风

雅浪漫的诗意氛围,更人文,更清新优美。你想,哪怕是卖菜小贩、酒店服务员、挑粪工这样社会底层的人,谋生劳累之余不是去喝酒、K歌、打麻将,而是去永宁泉品茶,到雨花台赏夕阳,那么这个城市该美丽、文明、诗意、浪漫到什么地步啊!

“民以食为天”,饮食是文化的载体,就是吃鸭子,南京的今昔也是大有差异的。南京有“鸭都”之称,食鸭之俗源远流长,五代时期顾闳中的传世之作《韩熙载夜宴图》中就有丰盛的鸭宴。在明清,食鸭即使于士大夫阶层也是一件雅事。明代有民谣云:“古书院,琉璃截,玄色缎子,盐水鸭。”古书院指的是南都国子监;琉璃截指的是被称为当时世界奇迹的大报恩寺,玄色缎子指的是南京著名特产玄色锦缎,而小小的盐水鸭居然并列其中。曹雪芹爱吃鸭子,当年他在北京西山开具借读《红楼梦》的条件是拿黄酒和烧鸭来换。他说:“若有人欲快睹我书不难,唯日以南酒烧鸭享我,我即为之作书云。”这也许就是他的好友敦敏在赠他的诗中所说“秦淮风月忆繁华”吧!《白下琐言》记载:粤东冯晋渔刺史慕,侨居明瓦廊,性嗜鸭,凡赴友宴饮,必先问有鸭几何品尝,谓“金陵所产鸭甲于海内,如烧鸭、酱鸭、白拌鸭、盐水鸭、咸板鸭、水浸鸭之类,正四时各擅其胜,美不胜收。予所以侨寓是邦者,正为此耳”。乾隆皇帝曾在《秦淮歌》中写道:“薛鸭袁羊饪珍食”,这里的“薛鸭”便是烹制全鸭席的厨师。袁枚在《随园食单》中对金陵各式鸭饌做了淋漓尽致的总结,计有10种之多。诸如:烧鸭——“用雏鸭上叉烧之。冯观察家厨最精”;挂卤鸭——“塞葱鸭腹,盖闷而烧。水西门许店最精。家中不能作。有黄黑二色,黄者更妙”;干蒸鸭——“杭州商人何星举家干蒸鸭。将肥鸭一只,洗净斩八块,加甜酒、秋油,淹满鸭面,放磁罐中封好,置干锅中蒸之;用文炭火,不用水,临上时,其精肉皆烂如泥。以线香二枝为度”;野鸭团——“细斩野鸭胸前肉,加猪油微纤,调揉成团,入鸡汤滚之。或用本鸭汤亦佳。太兴孔亲家制之甚精”。到了民国,一道以鸭胰烹制的“美人肝”位列马祥兴菜馆“四大名菜”之首,名流政要争相食之。现在,南京的街头巷尾,鸭子店常常比邻而立,但是鸭子之于南京人,已经没有风雅和诗情,只有市井味了。

二是现在的南京人很难说是六朝建康人的后代。历史上,南京城曾

经历过五次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第一次被称为“衣冠南渡”——晋皇室南迁并在建康定都，北方世家大族与大批百姓南渡侨居。《晋书·王导传》说：“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此时南渡至长江流域的北方人总数约 70 万。在南迁移民中，不少人移居建邺。如西晋永嘉元年（307），琅琊王司马睿从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移镇建邺，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淮北流民跟随其过江，其中仅来自山东琅琊（今临沂）的移民就达 1 000 多家，后来在建康侨置怀德县安置南移人口。第二次发生在北宋末年至元朝，南京人口迁移再掀高潮。北宋末年，金人大举南下，北宋亡国，随后是长达 100 多年的南宋与金的南北对峙。这一重大的历史变动，又促发了一场人口大迁徙，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均堪与“永嘉之乱”相伯仲。此间大批汉人过淮越江，追随宋室到南方避难。建康为六朝都城，山川险要，宋高宗曾驻蹕于此，拟作北上抗金的基地，移都临安后，建康仍为军事重镇，号为陪都。因此，南渡人民中有不少人在建康定居下来。绍光三年（1133），汪藻上书：“今年建康、镇江为韩世忠、岳飞所招遁者无虑万人，其情可见。臣以为莫若因此时用六朝侨寓法，分浙西诸县，以两河郡名之。”作为南宋陪都和沿江军事重地，建康府驻有大量军队。乾道七年（1171），宋孝宗将从来只设置在首都的“三衙”之一的“侍卫亲军马军司”2.7 万人，全部从临安移驻建康府，驻守于城内及近郊。此外，建康府还有江防军、水军、地方军约 3 万人。元代统一中国，造成一次人口的大迁移与大融合。南京“城中人八方集”，有“北人、色目、蒙古、畏吾儿、回回匠、马契丹、汉人”等军民凡 23 等。第三次发生在明初。据史书记载，明初南京人口变动很大，朱元璋将相当数量的原金陵居民迁往云南边疆，又大量移民“填实京师”。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十三云：“初明太祖之下金陵也，虑反侧，尽迁其民于云南，而徙南直隶浙江民二万户于京师，充仓脚夫。命户部籍天下富民万四千三百余户，徙其家实京师，曰富户。”那时，南京城内总人口为 47.32 万，外来移民将近一半。明成祖迁都北京，从南京迁走“民匠户二万七千以行，故户口灭其半”。第四次发生在 1864 年，曾国荃带领湘军攻破时为太平天国首都的天京，大肆屠城之后大量移民涌入，主要来自河南、湖北、淮北、苏北，大多是底层贫民和贫苦农民，南京郊区更是以河

南移民为最多。第五次发生于1937年南京大屠杀后。日军攻陷南京后30万居民惨遭屠戮。“屠城”使得人口急剧减少,战后又一次迎来了移民潮。

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融合,使南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直接影响着南京人习俗和文化心理的变迁。以婚俗为例,在移民南京的北方人眼中,土著南京人的婚俗逾礼者甚多。如正室、侧室之分及嫡庶之别,不如北方严格,所谓“江左不讳庶孽,丧室之后,多以妾媵终家事,疥癬蚊虻,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斗鬩之耻。”妇女也显得温良柔弱。《颜氏家训·治家第五》说:“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惟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这与北方“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母或“代子求官”,妻或“为夫诉屈”形成对比。然而经过六朝数百年的南北融合,“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婚姻程序也大体沿用“六礼”,而尤重婚姻缔结的门当户对。受北人性格的影响,南京人的柔腻、内秀之色少了一些,而多了一些粗犷、泼强。又如南京话的演变,也明显地受到人口迁移的影响。魏晋时期,南京话尚属江东方言即吴语区。永嘉之乱后晋室南迁,建康成了东晋都城,语言融合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就连王导也放下身段学说吴语。经过东晋与南朝二百多年的交融,形成了源于洛阳晋音而在江南得到发展的南朝正音——中古金陵音系。到了明代,南京话经过与江淮一带方言的同化、融合,逐渐具备了综合的性质,成为当时的江淮官话。明清两代的中国通用语“官话”是南京话。西方传教士来华,也将南京话当作通用语。据说明末来华的法国人金尼阁所著供西方人学习汉语的《西儒耳目资》一书,就是将南京话作为基础方言,直接用南京语音来标注字音,向世界介绍汉语的。总而言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当代南京人的性格特征是一千多年以来历代南京人的性格特征叠加、演进的结果,“大萝卜”特点更与六朝人物精神、六朝风流风马牛不相及了。

一个城市文化品格的形成,离不开自然环境因素,更离不开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从自然环境看,南京位于吴楚相交之地、南北会合之所、江海枢纽之处,同时又依山(钟山)傍水(长江),秦淮、金川两大水系穿城而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南京的山水之胜,培养了南京因水而生

的灵性和缘山而生的敦厚；南北交汇与东西相接使得多种文化在这里激荡融合、交相辉映，由此也形成了南京人兼有北方人的豪放粗犷、慷慨质朴以及南方人的细腻柔和、聪慧机敏。从政治因素的影响看，南京有长达 450 多年的定都史，形成了包括丰富多彩的都城文化在内的深厚文化积淀。南京又一直处于历史震荡的焦点，战乱频仍加之政权更迭使得南京城池屡屡被毁，人口大起大落。南京城经历的数次毁城既锤炼了南京人的心理承受力，也形成了南京人随遇而安、听天由命和注重眼前、不思长远的消极心态。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徙、聚合在给南京的文化品格带来光怪陆离的外来成分的同时，也使得其难以对各种文化元素及时主动地选择、吸纳和消化。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来看，自南唐将国都南迁秦淮二十四航，改变了六朝时建康都城将政治区与工商业区、居民区分离的状况，秦淮河沿岸成为南京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带，为市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需求空间。尤其是明代以后科举制度兴盛，各地举子云集位于夫子庙的贡院，催生了日益繁盛的工商业和十里秦淮的灯红酒绿，并将异彩纷呈的南京历史文化荟萃于斯。

四

南京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文化品格？所谓的“六朝古都”，所谓的“十朝都会”都只能作为记忆，储存在泛黄的档案中，凭吊的人也日渐稀少！在 2004 年举办的“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博览会·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名人对话”会上，有一位著名的文化学者认为南京文化多次流失，因而南京“在文化上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地位”，一再说“南京历史的传统……已微乎其微”。

我们不得不佩服朱偰先生的先见之明，当年他的《金陵古迹图考》一书出版时，他说十年之后读者将凭借这本著作，按图索骥感受南京的今昔之变。他也一言成谶，今天的我们确实只能从他的再版著作里，通过一幅幅有些模糊的黑白照片感受南京的古都风貌了。

无独有偶，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有一部地方志以文化遗产普查的形式，也给我们留下了关于南京古都风貌的记忆。这部地方志亦即《新京备乘》。关于该书辑者陈乃勋的生平，史料记录几乎无迹可寻，仅从

《新京备乘》之《自序》可略窥一二。民国十八年(1929),陈氏“授代第三专税局务”。此时他虽年已六十,然“忆昔山川登眺,每耽康乐清游,杯酒纵横,未除元龙豪气。抚白马红羊之劫,感慨沧田;访龙蟠虎踞之遗,歛歛故垒。漫为札记,藏诸巾箱”。后来他将书稿示其姻亲杜福堃,杜氏为之而补缀亡佚,“复发其旧所藏书相与考订”,“哀然成帙”,遂成《新京备乘》。该书于民国二十一年由清秘阁南京分店铅印,民国二十三年重印。内容专以金陵为限,除历史记述外,上限始于明清之交,下限迄于民国十九年(1930)。该书收录城治(附故城)、山水、古迹、名胜、园第、祠宇、寺观、陵墓、公廨、街坊(附桥)、井泉共 253 条,收录建置、政闻(附官制)、掌故、人物共 60 条,收录艺文、金石、名人轶事、风俗(附游观)、灾劫、物产、杂摭共 104 条。透过这本书,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当年的南京仍未坠千古名都的神韵脉络与空间肌理,联想起先秦传说、六朝人物、唐宋掌故、明清园林和近代硝烟。

《新京备乘》资料采摭之繁富,纪述之精详,堪称 100 年前南京古迹遗存的全真记录,即使对当代南京的文化遗存保护仍然具有“地图”一样的作用,至少可以让我们以更有文化的方式对待文物保护。例如,如果有关人员研读过本书,就不至于将江宁织造府(署)复建在大行宫江宁织造局的遗址上。织府实有局、署之分,织局即为织工织造场所。对此,《新京备乘》有详尽的表述:“江南织造,向以内务郎中、员外郎为之,掌造作缣帛纱縠之事,用异其物,品异其事,署在淮青桥大街,织局旧在西华门大街汉府内,后因购珠宝廊民房二百余间,遂移局焉。”

《新京备乘》还给我们留下了关于老南京风土人情的记忆,当年六朝烟水气息依然清晰可辨。除了可以重温那些富于浓郁生活气息的风俗外,我们或许尚能探得南京人“大萝卜”之称谓的缘由:“红萝葡,俗名南京红,通济门外东岳庙附近产者最佳,以其地沙土也。大者重约一斤,色鲜红,叶绿,食之清脆而嫩,作荔枝香而不辣。”原来“大萝卜”是南京的土特产!

我们亦能从《新京备乘》中感受南京的英雄之气。陈乃勋在该书中记述了其父陈麟书在清光绪年间任长江水师金陵营参将时保护温峤墓的一段往事,读来令人肃然起敬。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陈乃勋之父

陈麟书任长江水师金陵营参将，署在幕府山麓，距江滨二里。光绪二十七年(1901)，“夏大水，没岸三尺，沿江通路冲没”。水退后陈麟书组织修整工事时发现了一些古砖，“见所用砖，外多泥痕，砖长质细，有麻布纹”。经过调查，陈麟书得知这些古砖来自署后的古阜。他根据考古界“砖有麻布纹者，当为魏晋时代物”的说法，判断这古阜为魏晋时古墓遗址。陈麟书“如其地履勘，古阜约六七尺高，穹形顶已划削，立禁工人，毋得侵取”。他同时查阅府志，根据墓在幕府山西，以及“距墓约五里许有业农温姓者”，称“相传此阜为其远祖之墓”等证据推断，此古阜即为温峤之墓。于是陈麟书“比即呈明大府，捐廉重修，垒甃增高，并树碑表记”。虽然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老虎山麓所谓温峤墓与温峤无关，但此墓发现时正值“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与温峤所处“五胡乱华”的时代背景十分相似，所以陈麟书在重修“温峤墓”碑记中感慨：“公生当典午陵夷，偏安江左，五胡乱夏，而又有祖约、苏峻之变，公能与陶侃、王导辈安内攘外，卒平苏祖而拒诸胡，忠义烁于当时，厥功甚伟。”而今“汛境”难得“谧静”，神州大地列强横行，忠义如温公者何在？能“拒诸胡”如温公者何在？光绪二十八年距今已逾百年。想当年，在这荒山幽谷之中，英雄祭英雄，古人吊古人，日薄西山，枯树萧瑟。其情其景，可泣可叹！

葛剑雄先生说：“为延续文脉着想，一座城市需要保存最低限度的古物旧物，才能保持城市的历史记忆。因为这些物曾经是城市多数居民的住所或活动场所，也是当时的文化和传统赖以存在和延续的物质基础。如果让城市的后人仅仅凭着文字和图像去想象，大多数人是不能理解生动的历史，留下深刻记忆的。”无疑，《新京备乘》给我们列出了一个长长的文化遗存清单——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不仅有助于我们亡羊补牢，不再让这些屡经劫难的古物旧物为城市现代化买单，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恢复老南京关于“六朝古都”、“十朝都会”的城市记忆。

顾金亮

2014年5月谨记于金陵科技学院

自序

中华民国十有八年夏四月，乃勋授代第三专税局务。年六十矣，劳尘沕息，倦羽知归。费中户十家之产，治金陵一亩之居。旧巷延龄，数椽容膝。于是揆止足之分，顺推移之化。乐遂初服，还读我书。忆昔山川登眺，每耽康乐清游，杯酒纵横，未除元龙豪气。抚白马红羊之劫，感慨沧田；访龙蟠虎踞之遗，欷歔故垒。漫为札记，藏诸巾箱，只目怡悦而已。顾师丹未老，积久辄忘。絳灌无文，行而不远。霭簪姻家，居邻浍比，晨夕过从。每与谈胜迹，述遗闻，辄出宿稿，丐与订正，考献征文，旁搜博览。显微章隐，敢云发潜德之幽光；补阙拾遗，聊冀储官书之别录。渐历寒暑，哀然成帙。区为廿二类，约成十万言。颜曰《新京备乘》，岂徒泥爪堪寻，尤幸他山攻错也。望岳麓之云封（勋绘有《瞻麓图》，征当代名流题词刊行），愧读泂冈墓表；哀江南之春老，窃拟开府生平。半生戎马，幸托编简以娱年；匝地风云，聊赋衡门而栖隐。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二月述庐主人陈乃勋于白下瞻麓堂

弁 言

陈君述庐亲翁，幼侍振威公随宦金陵，壮年以往，服官兹土，游迹遍江南北。博闻强记，于江苏地理政教风俗，夙所究心。每遇当道有所咨询，辄慷慨而谈，若指掌，若罗胸，若左右逢源，原原而本本，况金陵其所托处见闻尤稔者耶。曩尝出其关于金陵故事札记稿本见视，嘱为整理而补缀之，复发其旧所藏书相与考订。初亦第拟诸白下余谈及琐言之例耳，积以岁月，搜罗倍勤，范围式廓，参伍错综。部居类别，久而后定，以是知著述者必先兢兢于体例也。颜曰《新京备乘》，盖冀夫他日修都邑志者，或有所取裁云。至若编辑旨趣，具详例言，不复述。是编多出于述庐亲历，故其言较信而可据。夫造屋者必基之固而后宏结构，治水者必源之清而后利疏浚。然则兹书之得所凭藉而成，岂非余之所深幸耶！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杜福堃识于首都